

儒道融合与

中国古代文论

儒道融合与汉代文论

儒道融合与魏晋文论

儒道融合与南北朝文论

儒道融合唐代文论

儒道融合与宋元文论

儒道融合与明清文论

儒道融合与文论的研究对象

儒道融合与文论的理论范畴

儒道融合与文论的研究方法

张恩普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儒道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论

张恩普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儒道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论

著 者:张恩普

责任编辑:胡学军

封面设计:孙浩翰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60mm×650mm 1/16

印 张:22.5 字数:3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309-2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 000册 定 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	-------

上 编

第一章 儒道融合与汉代文论·····	(17)
第一节 汉代文论的文化走向·····	(17)
第二节 汉代文论的自觉意识·····	(30)
第二章 儒道融合与魏晋文论·····	(43)
第一节 魏晋文论的文化走向·····	(43)
第二节 魏晋文论的自觉意识·····	(60)
第三章 儒道融合与南北朝文论·····	(72)
第一节 南北朝文论的文化走向·····	(72)
第二节 南北朝文论的自觉意识·····	(86)
第四章 儒道融合唐代文论·····	(98)
第一节 唐代文论的文化走向·····	(98)
第二节 唐代文论的自觉意识·····	(109)
第五章 儒道融合与宋元文论·····	(118)
第一节 宋元文论的文化走向·····	(118)

儒道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论

第二节 宋元文论的自觉意识·····	(132)
第六章 儒道融合与明清文论·····	(145)
第一节 明清文论的文化走向·····	(145)
第二节 明清文论的自觉意识·····	(157)

下 编

第七章 儒道融合与文论的研究对象·····	(175)
第一节 以心为主与“文心”理论·····	(175)
第二节 才性评析与“文品”理论·····	(202)
第八章 儒道融合与文论的理论范畴（上）·····	(220)
第一节 原道与“文道”理论·····	(220)
第二节 气与“文气”理论·····	(234)
第三节 意象与“意象”理论·····	(248)
第九章 儒道融合与文论的理论范畴（下）·····	(263)
第一节 虚静与“虚静”理论·····	(263)
第二节 言意与“意言”理论·····	(274)
第三节 通变与“通变”理论·····	(286)
第十章 儒道融合与文论的研究方法·····	(301)
第一节 “知其人”“论其世”与“知人论世”·····	(301)
第二节 “中庸”“守中”与“唯务折衷”·····	(314)
第三节 “溯流别”与“溯源流别”·····	(329)
参考书目·····	(348)
后 记·····	(351)

导 论

一、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

儒家和道家是我国古代两大对立的哲学派系，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却走了一条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之路。儒家和道家的这种历史发展态势，不仅对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和演进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我国的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源头上看，儒家和道家都发源于夏商周文化，尤其是发达的周文化，而直接的动因，则是春秋时期周文化的衰微。儒家是周文化的继承者与捍卫者，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要全面恢复周文化。而道家则提出了“自然无为”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自然无为”才能恢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因此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甚至有些极端。但是儒家和道家在它们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那里，有许多方面是相同或相近的，比如重视人事的研究，这在儒家、道家乃至墨家都是十分接近的。儒家十分重视人事的研究，第一个提出人道的观点，把人道作为理论阐释的中心。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仁”，什么是“仁”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仁者爱人”（《论语·颜渊》）。道家虽然大力提倡自然之道，但是在道家的自然原则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老子哲学的核心是“道”，但老子的哲学目标并不在于研究“道”本身，如果是那样，就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一样而以自然为对象了。实际上老子的哲学目标是如何通过内在修养达到自我超越而进入“道”的境界，所以他提出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致虚极，守静笃”

儒道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论

(《老子》第十六章)的主张,不是要“爱人”,而是要从自己做起,每个人都这样做了,自然就能恢复“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了。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关爱生命,重视人事这一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上是一致的。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和道家以对立统一,矛盾互补的模式,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崇阳,道家尚阴;儒家积极入世,道家超然世俗;儒家主动贵有,道家主静贵无;儒家强调道德教化,道家强调自然无为,它们又互为补充,达成社会进取与个人追求的均势与平衡。儒家和道家这种对立统一、矛盾互补的模式,促使其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融合发展的趋势。

儒家和道家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体系,导致了它们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融合发展。首先将儒家和道家思想融合到一起的是荀子。一般认为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实际上,荀子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只不过儒家思想的成份占的比重大一些。而在儒道融合上,荀子首开先河,比如,关于天人关系问题,荀子反对天命观,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的观点。他把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改造为“不与天争职”,主张“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天论》),并认为这是“天职”。而他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的观点与思孟学派的“与天地参”的思想有着十分切近的渊源关系,实际上,荀子已经将儒家的人道有为与道家的自然无为融为一体了。荀子对儒道思想的融合有开先河之功,又有启后学之绩。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的。

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并非是指儒道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融合,合而为一,而是指在后来的思想文化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无论是在社会的思想体系中还是在个人的思想构成中都同时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影响作用。这两种思想的对立性和互补性,有力地调整社会乃至个人向着和谐和奋进的方向发展。

我国古代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具有持久性。这是说,儒道思想的融合

从荀子开始，中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直到清代，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其他思想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消亡，只有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持久不衰，历久弥新。

其二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儒道思想融合发展的情形并不平衡。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占上风，但是汉代仍然是儒道兼宗；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是主要的思想意识形态，玄学“以道释儒”的思想方法使得道家思想占了上风；唐代崇道，亦是道家思想占上风；宋元时期“理学”以“援道入儒”的方式形成儒道兼容的新儒学，儒家思想占上风；明清时期“心学”兼容儒道，呈现儒道综合的特点。

其三是与佛家思想的相容性。佛家思想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一进中国就走了一条融合儒道的道路。儒家主张“仁者爱人”，道家主张自然空灵，这与佛家的向善逐空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因而，从南北朝时起，佛家思想就明显地介入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并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因子而长期存在。

二、儒道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

儒道思想的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道思想的融合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走向自觉。

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觉固然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但哲学与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家大都属于士人阶层，他们其中有的是政治家，如曹丕；有的是史学家，如司马迁、范曄、沈约；有的是哲学家，如王充。他们对古代哲学与文化十分了解，并身体力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这种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士人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自然会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体现在他们的自觉行动上。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主要的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作

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走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般说来，每一时代的社会思想的主流必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直接的影响。汉代社会思想的主流是儒家，但道家思想也存在其中，整体上表现出以儒为主，儒道并存的态势，这样影响到文论上也是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包括儒家的文艺思想；魏晋时期则正与两汉相反，儒家地位衰微使得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者所标榜的社会思想，因此，整个社会思想表现为外儒内道。与之相适应，文学思想亦表现为外儒内道，儒道兼容。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主流是儒道释合一，文论上亦表现为儒道释思想的综合影响，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沈约的文论。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每一位文论家那里，情况则各有不同，但这种趋势是存在的。

二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自觉意识的生成。所谓自觉意识，按一般的理解，就是促使人们进行自觉活动的主观意识，是人们自觉行为的思想动力。自觉是与自发相对的一种人类行为，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①文论的自觉意识则是指以文论家的主体意识主动自觉地研究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形成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家，如曹丕、陆机、挚虞、刘勰、钟嵘等正是以这种文论家的主体意识来研究并形成文学理论的。那么，中国古代文论家的这种主体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主体意识的形成导源于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形成。所谓个体独立意识，就是自我意识，即能够清醒地认识自我。中国古代时期被看作是自我意识觉醒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士人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标榜、自我强调、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倾向，如贾谊吊屈原、司马迁发愤著书、王粲好驴鸣、刘伶酒后放达、刘勰拦车荐书等。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主张人道有为、仁者爱人、内圣外

^①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4页。

王、追求大同，从而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道家则主张天道无为、自然齐物、逍遥自在、全生避害，从而鼓励人们超然世外，解放自我。这样两种哲学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必然产生巨大的能量，使其一方面要积极入世，追求功名，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淡泊功名，追求自我个性的超脱。

三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导致了中国古代文论对象系统的确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为文用心”与“品藻流别”，前者形成了“文心”理论，而后者则形成了“文品”理论。“文心”理论注重从“心”的角度，即文学创作心理思维发展过程探讨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这方面的代表。中国古代文论将“为文用心”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直接受到儒家和道家“以心为主”宇宙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以人为本，注重探讨人的生命价值。但这个人并不是自然的人，或生理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伦理的人。对社会的人、伦理的人的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关注的重点是“心”。儒家把“心”看作是人体的灵魂和统帅，并且是人领悟“道”的主要器官，主张“尽心知性”和心性修炼；道家亦注重心性修炼，主张“复归于朴”和“心斋”、“坐忘”。中国古代文论家对儒家和道家“以心为本”的宇宙观兼收并蓄，从而把“为文用心”作为文论的研究对象。“文品”理论则注重从“品藻流别”的角度探讨文学批评的内部规律，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钟嵘的《诗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中国古代文论将“品藻流别”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亦受到儒家和道家“才性评析”和“人物品鉴”思想的影响。同时，“才性评析”和“人物品鉴”亦体现了儒家和道家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本”的宇宙观。

四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发展。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十分丰富。先秦时期已经提出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如言志、比兴、兴观群怨、言意、虚静等，在中古和近代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中古和近代时期又产生了诸多新的理论范畴，如文气、文意、原道、缘情、神思、体性、风骨、隐秀、通变、滋味等。这些文学理论范畴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

展，文学理念的进化；另一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实践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相当多的概念、范畴的提出，都能找到儒家和道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印记，其中有的概念和范畴，则直接引入或转用儒道思想体系中的相关概念、范畴，如文气、原道、言意、虚静、通变等；有的概念和范畴虽然不是直接引入儒道思想体系中的相关概念、范畴，但明显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如刘勰提出的神思说，就直接受到道家思想的启迪，风骨说则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有密切的联系；钟嵘的滋味说则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儒道思想体系对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发展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国古代文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研究方法的运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在内容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其研究方法上的相通性也就十分明显，文论家们十分聪明地借鉴哲学研究方法，将其用之于文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古代哲学以人为本，注重探讨人的生命价值，这就必然使其“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是“人”，且重点研究人“为文之用心”，这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取向是一致的，因而，“知人论世”的方法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把人作为“天地之心”，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中庸”的思维方法亦是广泛应用，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把“中庸”、“守中”、“中道”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这一方法同样受到中国古代文论家的青睐，从两汉至南北朝，“唯务折衷”亦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此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所使用的“溯源流别”的方法，也能在儒家和道家的哲学研究中找到归宿。

三、中国古代文论自觉的演进过程

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觉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两汉

两汉是中国古代文论由非自觉逐步转向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文论家的个体独立意识由朦胧逐渐变为清晰，觉醒程度不断增强。如贾谊《吊屈原赋》中对屈原自杀的不解，已经明显透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独特认识，视角开始转向自我价值的实现；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受到常人不可忍受的极刑，他之所以能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其主要的思想支柱就是要完成《史记》，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扬雄则以一反众人对赋的推崇，把赋看作“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来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他仿《论语》而制《法言》，同样是为了标榜自己，突出自我；王充则通过“自传”来彰扬自己的个性，表现出个体的与人不同。

两汉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促发了文论的自觉发展。由于注重独特认识和独到见解的表现，两汉文论家开始把“文学”和“文章”的概念分开阐述。刘歆所著《七略》中，已经把“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等图书并列，这是把文学作品与其他书籍明确区分开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方法，这表明把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分开阐述，已经成为汉代文论家的共识。另一方面，两汉文论家也开始注重对文学家及文学作品进行专门评价，其典型案例就是对屈原及《离骚》的专门评价。汉代文论家对屈原的评价往往是从《离骚》入手的，因而，屈原在汉代文论家眼里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学家。对屈原和《离骚》的评价，西汉有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歆、扬雄的《天问解》；东汉有班固的《离骚经章句》、马融的《离骚注》、王逸的《楚辞章句》等。可以说，有汉一代，对屈原和《离骚》的专门评价贯穿始终。在理论建树上，两汉文论家已经开始注重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明确阐发了文学创作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源泉问题；扬雄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丽”的特质，尽管他仍然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对文学作品“丽”的特质的探讨，显示出汉代文论家审美意识的初萌。

从以上的论述看，汉代文论已经有了自觉的发展，但这种自觉总的

说来还是初步的。一方面，汉人所论述的文学理论问题是有限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问题还没有进入文论家探讨和研究的视野，许多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问题还未引起文论家的注意；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专门的文论家和专门的文论著作，文论家大多是“兼职”的，他们原本属于史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而非专门的文论家，虽然论述了一些专门的文学理论批评问题，但大都包括在其史学、哲学、政治著作中。

（二）魏晋

魏晋是中国古代文论进一步走向自觉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文论家的个体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更加注重自我的实现和个性的自由，并明确把扬名后世作为重要的个体追求。如曹丕对著述的重视，达到了魏晋士人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可以不朽”的自我价值只有“立德扬名”与“著篇籍”，“著篇籍”虽然排在“立德扬名”之后，但其与“立德扬名”具有同样的生命价值。阮籍则崇尚对个体自由的绝对追求，他不拘礼法，任情适性，母丧之时，仍然喝酒吃肉，而且客吊不哭，常人难以理解，但阮籍却认为很正常。

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自由，表现出魏晋文论家的个体独立意识的进一步强化，进而导致了文论自觉意识的形成。一方面，文论家明确地站在文学理论批评的立场上，以阐述文学原理、品评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规律为目的，专门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如曹丕撰写《典论·论文》，陆机撰写《文赋》，挚虞撰写《文章流别论》，都是以文论家的主体意识，而不是以政治家的主体意识来阐述文学问题的；另一方面，文论家开始以审美的眼光分析文学问题。如曹丕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审美主张；徐干提出“美育群才”的美育理念；陆机提出了“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美学要求；挚虞提出了“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审美方法。

文论自觉意识的形成，促进了文论自觉向着全面的方向演进。一方面，探讨和研究的文论问题十分广泛，包括了文学理论的绝大多数内容。如文学本质（挚虞：“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文学地位作用（曹丕：“文章经国之

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言意之辩”）、文学的体裁（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文学创作（陆机《文赋》）、文学批评（曹丕《典论·论文》）、文学风格（曹丕《典论·论文》）等。另一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文论和独立的文论著作。如曹丕及其《典论·论文》、陆机及其《文赋》、挚虞及其《文章流别论》、李充及其《翰林论》。此外，象应场的《文质论》、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葛洪的《抱朴子》等，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论著作，但亦从某一角度阐述了文学理论批评问题。由此可见，魏晋时期的文论以蓬勃发展之势，大大超越两汉，并促进南北朝时期文论的成熟。

（三）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文论家的个体独立意识趋向成熟，他们不再是对个体自由的绝对追求，而是孤芳自赏，恃才傲物。如颜延之的“文章之美，冠绝当时”，所以他自恃才高，性格孤傲，在高官面前也经常“负其才辞，不为之下”；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也“为性偏激，多愆礼度”。同时，南北朝的文论家也更注重对个人成果的推重量，如范缜坚持推行其“神灭论”的思想，高官厚禄不为所动；刘勰为将自己的《文心雕龙》推介出去，不惜冒险假作“货鬻者”，“干之于（沈约）车前”。（《文心雕龙·序志》）这些行为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家个体意识的成熟。

个体意识的成熟促进了文论自觉意识的成熟。魏晋时期已经觉醒的文论主体自觉意识和审美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不仅从文论家主体地位和审美理念出发专门阐述文学理论与批评问题，而且具有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和构建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理论创新自觉意识即有意识地进行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的创新，探索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如沈约创造“四声谱”，在他看来是他“独得胸衿”的独特发明；范晔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书》）的新文学理论思想等。构建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则表现为自觉地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体系建设，不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而是有意进行理论体系的全方位构建，如刘勰著成“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

卷五)的《文心雕龙》;钟嵘写定“思深而意远”(《文史通义》卷五)的《诗品》。这不仅表现为个体自觉意识的成熟,而且更多地表现为文学理论与批评自觉意识的成熟。

文论自觉意识的成熟,促进了文论自觉的成熟。一方面,出现了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学集团,如“竟陵八友”和昭明太子集团,他们不仅有文学方面的成功,更有文论方面的建树。“竟陵八友”的主要成员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他们是在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梁书·武帝纪》)时结成的文学集团,他们在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文学理论批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其著名的研究成果就是“声律论”,沈约、谢朓、王融直接从事这项开拓性工作。昭明太子集团是以昭明太子萧统为首的东宫文学集团,其突出的文学研究成果就是编辑了《昭明文选》。另一方面,出现了体系完备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理论深入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它由“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所构成的“总论—上篇—下篇”结构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它以“笼罩群言”(《文史通义》卷五)的思维模式,广泛探讨了文学理论批评的诸多问题,堪称中国古代文论之最,它阐述理论问题的深度不仅是当时的集大成者,对后代文论的研究亦产生深远影响。《诗品》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创造了诗歌研究和品藻的系统理论,它以“深从六艺溯流别”(《文史通义》卷五)的批评方法,在探讨诗的历史继承关系、诗的评价体系、诗的批评方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唐代

唐代我国古代文论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文论家的个体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从而促进了唐代文论家文论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并促进了文论的发展。一方面,这一时期士人的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六岁就能写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但他恃才傲物,往往为此召来麻烦。《旧唐书·王勃传》云:“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

令入府。”这么做实在不值得，但却体现了王勃的狂傲风格。另一方面，唐代士人漫游之风十分兴盛。唐代士人的漫游，并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借欣赏名山大川而纵情山水之间，也就是说，漫游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这种明确的目的性体现了唐代士人明确的个体独立意识。如李白《秋下荆门》诗中所写：“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一句“自爱名山入剡中”将此行的目的表露十分清楚。此外，唐代许多学者士人，在青年时期，入仕之前，大都有一段读书山林的生活经历。这种读书山林，亦是有意为之的，旨在出山之前，能做好思想上知识上学识上的充分准备。读书山林生活的选择，亦是个体独立意识增强的具体表现。陈子昂曾读书于金华山的玉京观；李白18岁时就隐于大匡山中读书，一读就是几年；岑参15岁时曾隐于嵩阳读书；刘长卿曾读书于嵩山。

唐代学者士人的个体独立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其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心，使得唐代文论的自觉意识愈加鲜明与突出。一方面，他们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唐代文论家对南北朝时期的文风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批判精神形诸笔端。刘知几是初唐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兼文论家，他对魏晋以下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其中的弊端。韩愈对骈文的批评是明确的，他虽然没有直接指出骈文的弊端，但他明确地把魏晋以来的文章排斥在阅读范围之外，则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对六朝以来骈文的不满。另一方面，唐代文论家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建树意识，虽然未能形成如《文心雕龙》那样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某一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却有较为深刻的思考形成了学术价值颇深的理论。

文论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使得唐代文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文论家提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思想。如殷璠的“兴象”理论，王昌龄的“诗境”理论，韩愈、柳宗元所提出的古文理论是唐代文论家所提出的最系统、最完备的文学理论；还有陈子昂的“兴寄”理论、释皎然的“意境”理论、白居易的“平民”理论、司空图的“风格”理论等等。

（五）宋元

由于宋元时期社会思想形态是儒强道弱，因此，士人个体独立意识也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一方面是深沉的忧患意识，范仲淹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意识；向敏中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留别知己序》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古者无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伟哉，达士之格言，人伦之妙端也！”另一方面是广泛的责任意识，宋代士人的参政热情很高，他们往往通过科举考试而踏入仕途，入仕后他们往往十分看重自己肩上的责任，积极上书，敢于言事。此外，宋元士人对自由的追求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更多地去向内心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因此，宋元士人的个体独立意识更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淡泊，呈现一种理性的超脱，诚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个体独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使文论家的文论自觉意识也随之增强。一方面，宋代文论家在阐述一些文学理论问题时，往往自觉地运用抽象思想，从抽象层面上去阐述理论问题。“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是宋代文论家十分关注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政治家、道家、古文家的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从抽象层面上来认识问题的。另一方面，宋元文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求异意识，他们既不满意于前代文论家的理论创新，也不满意于当代的理论成果，而是要独辟蹊径，阐发自己的独到的研究成果。此外，宋元时期文论家理论评析意识亦是十分浓重的，他们或是在各种书、序中，或是在专门的诗话作品中，对前代文学创作及作品进行品评分析，在品评分析中展露自己对前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品评分析中阐发自己的文学观点。最能体现宋元文论家理论评析意识的是宋代诗话的写作。

文论家文论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促进宋元时期文论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诗文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如关于“文”“道”关系认识的深入；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许顗的《彦周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代表的诗话著作群；出现了一批文学流派。另一方面，词、曲、小说理论也开始兴起。出现了第一篇词论专门论文，李清照的《论词》，出现了全面地总结元代戏曲创作经验的专著，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及关于小说的一些理论